

物质性与流动性：对戴维·莫利传播研究议程扩展与范式转换的考察

王鑫

书籍信息

《传播与流动：移民、手机与集装箱》，戴维·莫利著。西萨塞克斯郡：约翰·威利有限公司，2017年版，245页。ISBN: 978-1-405-19200-2, 18.75英镑。

关键词

戴维·莫利、传播、物质性、流动性

作者简介

王鑫，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电子邮箱：495835036@qq.com。

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BBC中国题材纪录片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研究（2000-2015）》（项目编号：16BXW037）、2020年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经费年度项目（基础研究）《物质转向与流动性：传播学发展新的内容、范式与向度研究》和辽宁大学2020年度学科建设项目《传播学物质转向视野下的中国百年交通变迁与传播发展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DOI:10.13495/j.cnki.cjic.2020.09.009

Materiality and Mobility: An Research about David Morley'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genda expansion and paradigm shift

WANG Xin

Book

Communications and Mobility: The Migrant, the Mobile Phone, and the Container Box, By David Morley. West Sussex: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7, 245pages. ISBN: 978-1-405-19200-2, £ 18.75.

Keywords

David Morley, communication, materiality, mobility

Author

Wang xin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Liaoning University. Email: 495835036@qq.com.

This paper is a phased result of the General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in 2016, "A Study of BBC Documentaries on Chinese Themes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Culture External Communication(2000-2015)” (project No.: 16BXW037), Annual Projec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 of Liaoning Provincial Education Department in 2020(Basic Research), “Material Turn and Mobility: Research on New Content, Paradigm and Dimension of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and 2020 Annual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Liaoning University, "A Study on the Hundred-year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terial Turn of Communication".

“重新定义传播”是英国媒介和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戴维·莫利(David Morley)在《传播与流动:移民、手机与集装箱》(*Communications and Mobility: The Migrant, the Mobile Phone, and the Container Box*)一书¹中的理论探索,旨在超越“媒体中心主义”²研究范式——专注于信息传播的符号、制度和技术维度的中介形式,把传播等同于象征性或修辞性的交流——进入到交通(运输)以及传播地理学研究领域。这一观点,使交通工具及其基础设施这些在“以媒体为中心”的传播研究范式下不被关注的部分显现出来,还将“流动性”这一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引入传播研究中,激发出传播学在跨学科研究中的潜力。特别是后疫情时代的到来,也使得流动性问题成为多学科关注的重点。莫利此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电视、家庭、受众以及媒介技术等方面,这次将研究转入到交通运输物质基础设施以及流动性方面,注重虚实空间的连通性,是其对传播“媒体中心主义”研究范式局限的反思,也是其自身理论研究的重要延展。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在探索传播研究新的范式和理论。2014年,《新闻记者》专门策划了“名师指津:学科篇”专题,张涛甫、杜骏飞、吴飞、孙玮、黄旦等学者对传播研究的问题、理论、范式等展开讨论,这也是国内学者对传播学科发展的一次深刻自省。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借鉴和反思国外最新研究成果,对传播的物质性、媒介化转向、具身传播等问题,从概念、路径、理论演化、方法等方面展开研究,着力开拓传播研究新的可能性(刘海龙,束开荣,2019;刘海龙,2020;章戈浩,张磊,2019;吕清远,2018;戴宇辰,2018,2020;丁方舟,2019;王琛元,2019)。这些讨论也提示一个重要问题,即以媒体为中心的传播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传播学科的想象力,窄化了学科研究的疆界,并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内卷化(involution)。在这一点上,中外学者存在一定的共识。国外研究者对莫利的探索有一些反馈,但国内近几年关于莫利的研究只是零星地出现在传播地理学(袁艳,2019;李淼,魏文秀,2019)以及其他的译介中(王鑫,2020),并散见于对传播物质性的思考中(戴宇辰,2020)。作为一次传播研究议程扩展的重要理论努力,莫利提出的“重新定义传播”并没有被有效地释读和廓清。本文旨在厘

清莫利“重新定义传播”的理论内涵和研究面向，即重返传播研究的物质向度以及运用社会学“流动性”的研究范式，扩展传播研究议程，恢复传播物质性与符号性的连接，为当代传播理论提供历史基础。为了避免“入乎其内”，而不能“出乎其外”，故将莫利的理论置于与北美和欧陆理论家思想的互文中，梳理“重新定义传播”两个研究面向——物质性和流动性的理论渊数，并从历时性角度呈现莫利提出“重新定义传播”的演进脉络；在共时性角度上阐明莫利重返传播研究物质基础的内容和意义，“流动性”范式在传播研究中的实践应用以及与传播接合之后对传播研究领域的拓展。莫利通过重返传播的物质基础以及对流动性的考察，修正了其此前关于虚拟空间的思考，也重新给予实体空间在传播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对空间的考察也不再是此前单一的实体空间或者虚拟空间，而是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连通和接合，旨在恢复符号与物质之间的“离散”关系。

一、“重新定义传播”——基于传播概念的历史和逻辑

莫利在《传播与流动：移民、手机和集装箱》一书开宗明义，“我的雄心就是重新定义媒介和传播研究的相关议程，特别是对传播定义的（再）扩展，以便能把（正如历史上曾经包括的一样）物的流动、交通运输以及地理等内容涵盖进来。”（Morley, 2017: 1）莫利在这里提出的重新定义传播，准确地说，是对传播定义和研究议程的扩展。莫利在“扩展”前面加了一个“再”<(re) expand>，这一值得注意的细节隐含了他对该问题的基本判断：物的流动、交通运输以及地理（空间）等内容原本就是“传播”概念的意涵之一，考察传播物质维度和流动性问题，并不是新发现，而是将被遮蔽的“传播”的另外之意显现出来。莫利为什么要重新定义传播？我们可以通过对传播概念的“物质性”意涵进行历史和逻辑的考察，进一步厘清莫利“重新定义传播”的意图和意义。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³（*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以牛津词典作为词源考古的重要依据，认为“在道路、运河与铁路蓬勃发展的时期里，communications通常是一个普遍的抽象名词，代表这些通讯设施”（威廉斯，2005：73-74）。莫利说，他家那本老旧的牛津字典中对传播（communication）的解释是“[名词]告知（特别是新闻）；提供的信息；交往；普通的门、两地之间的通道、公路、铁路或者电报”（《简明现代牛津词典》，1964）（Morley, 2017: 1）。这个解释包括了新闻、信息、沟通以及交通等内容，也就是说传播概念兼有人际交流、符号信息传递、物质基础设施等多重之意。在西方传播学发展的脉络中，传播与交通的同源显然是其

物质性的重要表征。阿芒·马特拉 (Armand Mattelart) 在《传播学简史》(*Histoire des Theories De La Communication*) 中也有所提及——19世纪, 基本的通信技术系统和自由贸易原则已经初现雏形, 传播作为人类社会整合因素的概念业已浮现; 同时, 劳动分工和运输渠道 (河流、海运和陆路运输) 被视为财富和发展的同义词 (马特拉, 马特拉, 2008: 1-2)。马特拉注意到19世纪与传播有关的两个重要方面: 通讯技术系统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詹姆斯·凯瑞 (James W. Carey) 认为, 无论是信息的传递, 还是把货物或者人运送到目的地, 都属于传播的“传递观”范畴, “我所谓的传播的传递观或运输观, 是因为它的中心术语的界定与19世纪人们使用传‘传播’和另一个词‘运输’有共通之处; 这也与19世纪人们使用通讯和运输在更广的空间和更多的人口中扩大影响力、控制力和权力的愿望密切相关。” (Carey, 2009: 33) 尽管在凯瑞这里, “传递观”并不是他要论及的重点, 主要是用来区分传播的“仪式观”, 但是他也承认, 传播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面向, 即传播与运输等物质内容有关。约翰·彼得斯 (John Durham Peters) 在《对空言说》(*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一书中认为传播具有“多义性” (比如有告知、分享、传授、链接、迁移、发射、传输、交换、符号互动等意义) (彼得斯, 2017: 10-15), 虽然他从人类状况的广阔视野上理解传播, 并从哲学上思考传播的主体间性的问题, 但也认为“物质性迁移”仍旧是传播 (communication) 的主要之意。约翰·费斯克 (John Fiske) 等学者在《关键概念: 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中对“传播”的解释⁴, 忽略了此前“传播”的物质维度, 一方面强调“以媒体为中心”, 另一方面强调意义传播和交互的过程; 前者与威廉斯将20世纪的传播理解为大众媒介相一致 (费斯克, 2004: 45-46), 后者偏重于信息符号交互和象征意义的研究, 又与凯瑞的理解异曲同工。而威尔伯·施拉姆 (Wilbur Schramm) 等学者对传播研究的学科化建制和研究疆域的厘定, 也将传播研究的内容和领域集中在符号信息传播方面, 并侧重效果研究, 加速了传播研究符号与物质之间的“离散”。随着大众传播的发展, 符号化的信息传播逐渐主导了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的内容。这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传播研究对交通运输及其物质基础设施的关注, 也忽视了对由此带来的社会多维流动性 (人、资本、物) 的考察。

通过简要回溯“传播”关键词的演进脉络可知, 交通运输和物的流动作为传播的基础之意, 却在概念的流转中, 或是作为其他传播观念的参照, 或是隐匿于传播研究的主流观念之下。莫利重新定义传播, 是在被忽略的交通运输及其基础设施这

条路径上探寻传播研究的更多可能性。这个古老的概念，不仅包括象征符号领域，也包括交通领域的研究，其范围不仅包括信息传播的工具，还包括当时的物质运输基础设施（Morley，2017：21）。物质基础设施，诸如航道、运河、铁路等交通运输系统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当代媒介和传播学者重视，莫利重新定义传播的目的之一就是恢复这种关联，而不是把交通及其基础设施等问题抛给地理学或者交通学研究，失去传播学的立场和维度。毕竟交通运输工具及其基础设施除了功能性作用，也有结构性作用，比如集装箱的发明对全球化问题促进——“集装箱是多式联运系统的关键，是全球经济赖以生存的分散生产链的物质基础，它可以允许材料在全球范围内无缝运输”（Morley，2017：119）。从隐喻的角度看，电视与汽车之间的关系与早期电报和铁路系统之间的共生关系一致。“我主张恢复对传播更宽泛的理解，而不是对它当代意义过程和表现的简化。”（Morley，2017：27）显然，将传播研究的问题和对象置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尤为重要，也有助于建立物质传播与符号传播之间的关联。

莫利在重新定义传播的同时，也对传播学研究近年来集中在“以媒体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研究范式“简单地把传播等同于象征性或修辞性的交流，它是基于这样一种本体论假设，即传播主要是一个涉及无形的非物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对传播的狭隘定义完全遵循狄德罗在话语层面上提出的用‘修辞’进行交流的科学方法。”（Morley，2017：26）传播学研究如果只关注最新的媒介技术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新”的变革，不能超越信息传播符号研究以及“效果导向”，很可能导致对不明显、旧的移动（流动）所涉及传播问题的忽视甚至视而不见。莫利从研究受众、电视和电子空间等问题转向对传播物质基础的考察，既是他对当下传播研究现状的反思，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其以往学术研究的超越。当今世界并不只是由新信息技术制造的“印象全球化”，还因为交通设施和通讯基础设施的差别被分割为各个具体的“地方”；新技术迭代迅速，但更古老的技术仍在继续主导着我们的生活，不过对技术的描述基本上是不平衡的，因为人们更关注发明而不是使用，然而更重要的是技术如何被使用，由谁使用（Morley，2017：7）。这就将传播与技术、阶层、权力、地域等问题再次连接起来。

重新定义传播之后，传播可能会被分为两个方向。

一方面，将带领我们通往人际和社会进程中的传播——“使事物更普遍化”的象征性过程。这是我们在媒介和传播研究中通过修辞学、社区研究和艺

术研究等工作更深层次的发现。另一方面，传播学将带领我们走向传递与流动方向，也就是在地理学和经济科学不同领域所研究的更加物质化的“传播”（Morley, 2017: 178）。

通过跨学科研究，传播在象征领域依然会有作为，而流动性问题以及传播研究的“物质化”向度，可在未来研究中释放更多的活力。莫利虽然批判了“媒体中心主义”，但是并没有矫枉过正，他在传播的空间性和流动性的考量中，坚持语境化思考，强调了传播物质性和符号性之间的互动和连通。

二、物的维度：传播研究议程扩展中对传统的重返与超越

“传播”关键词演进的历史和逻辑显示传播研究的物质维度应该重新得到关注和重视。莫利重新定义传播及其研究议程，主要关涉三个方面：第一，物的流动。重点在“物”，更在“流动性”，即除了物，也包括人、资本、信息、病毒的流动等；第二，交通运输。重点不只是交通工具，也包括与之发生关系的各种交通基础设施；第三，地理。重点在于物质地理和虚拟地理之间的共生模式和相互连接，也即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接合的问题。可见，莫利关于“物的维度”的理解，既有交通工具及其基础设施，也关涉到流动性和虚实空间接合的问题，意在将物质和符号关联起来，这也成为莫利传播研究议程扩展的重要面向。克劳斯·布鲁恩·延森（Klaus Bruhn Jensen）认为媒介的物质载体，包括人的身体、经典的大众媒介以及数字化的传播信息技术，即身体、技术和元技术（延森，2014：67-73）。这三个维度包含具身传播、经典的符号信息传播技术以及数字信息和传播技术，相比而言，莫利的“物质维度”则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莫利说，“我的观点可能在最近被称为‘物质转向’的传播研究背景下被有效地阅读。”（Morley, 2017: 8）为了更清晰的把握莫利从“物质”角度重新定义传播的思想系谱，需要把莫利的研究嵌入传播思想史以及与当下不同理论家思想的交光互影中解读。

传播研究物质传统，既有来自北美的，以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和凯瑞为代表；也有来自欧洲的，涉及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伊夫·德拉海耶（Yves de la Haye）以及马特拉等人。从莫利的研究旨趣以及构成逻辑上看，他对伊尼斯、凯瑞以及马特拉的追随更为明显。伊尼斯的传播观和方法论影响了莫利，促使其考察通讯设施和运输技术如何促使权力远距离发挥作用。众所周知，伊尼斯在研究贸易流

通（皮货贸易）史中萌生了研究传播时间和空间问题的想法，后来他在研究帝国统治和治理过程中发现，偏重于时间的媒介和偏重于空间的媒介影响了帝国不同的统治类型。伊尼斯没能在去世之前完成关于纸浆工业贸易历史的研究，不过他的思想一以贯之，伊尼斯的研究“既是地理学，也是传播学，或者可以被视作早期‘传播地理学’”（袁艳，2019）。在莫利的《传播与流动：移民、手机和集装箱》中，虽然只是零星地提及了伊尼斯，不过从莫利的教育背景以及后来的研究旨趣上看⁵，其与伊尼斯有诸多相似之处：对领土和空间问题的研究热情以及“基于历史的传播理论”，注重传播研究的历史的、经验的、阐释的和批判的研究模式，以及把传播定位在地理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的交会点上（凯瑞，2019：131-135）。伊尼斯的传播思想和观念显然成为莫利重新定义传播、关注传播“物的维度”的重要理论来源。凯瑞也非常推崇伊尼斯，在《空间、时间与传播手段——献给哈罗德·伊尼斯》（凯瑞，2019：137）一文中，他介绍了19世纪中期的纽约已经控制了内地的贸易与传播线路，包括航运、运河以及其他水路、高速公路和各种铁路枢纽系统，迄今依然如此。这些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将地域、领土、空间、权力等问题纠葛在一起，并与“发展”和“进步”这样的社会信仰缠绕在一起。在这一点上，莫利受到凯瑞的启发，并再次与伊尼斯之间呈现出思想上的承续。

而在传播研究物质转向这个问题上，莫利深受马特拉的影响。马特拉认为传播的最初理论来自于人种学家和地理学家，交通和传播在历史发展的某个时期并没有被截然二分。当时的“社会有机体”的思想非常流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也进一步解释了传播作为有机系统的观点，即由“道路”“运河”和“铁路”构成的配送系统，确保“营养物质”的分配。信息（新闻报道、请愿、社会调查）和其他传播手段，如邮政服务、电报和新闻机构，就是负责调节的神经系统，它们管理着中枢系统和外部设备的复杂关系（马特拉，马特拉，2008：3-4）。交通和信息传播是构成有机体的血管和神经，对社会有机体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马特拉将传播作为物质要素，促进人、货物和文化的流通的思考，成为莫利从物质性和流动性两个面向重新定义传播的理论渊源。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也强调物质基础设施对文化传播和扩散的意义，“如罗马的帝国港口和道路之于基督教、港口和航海之于文艺复兴、欧洲的公路和江河之于宗教改革、路桥工程之于启蒙思想在法国乃至欧洲的扩散，等等。”（德布雷，2014：275）事实上，莫利也在寻求这种联结。不仅如此，德布雷认为媒介学还有“联接传递革命史和运输革命史”这个任务没有完成，要考虑“电报和铁路之间、电话和

汽车之间、广播和飞机之间、电视和空间火箭之间”的连带性以及“发送和运输的期限如何同时改变了人类的想象空间和真实空间、幻象空间和实际空间”（德布雷，2014：273）。在这一点上，他们都赋予了“运输”重要的意义，莫利偏重于交通基础设施等物质基础的研究，而德布雷在他的媒介域的概念中包含了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上“运输”这个词的所有词义的累积效应（德布雷，2014：9）。笔者曾询问莫利是否受到德布雷的影响，莫利认为在运输领域，他和德布雷的兴趣存在着较大的重叠，但是他对法国哲学过于注重传播研究的“一般理论”和“哲理”不太认同，他更倾向在具体的语境中考察交通工具和物质基础设施与传播之间的关系。虽然这是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在媒介和传播研究方面的差异，但也显现出当前媒介和传播研究在国际范围内的重要转向，即超越媒体中心主义进入到更深广和开阔的历史、哲学、社会、文化以及美学视野中，并在跨国研究、文化地理以及交通研究领域内相互促进。美国学者保罗·亚当斯（Paul C. Adams）在《传播地理学：跨越学科的桥梁》一文中非常认同莫利的研究，“媒介与传播研究也有声音呼吁发展‘唯物主义的、非媒介中心的媒介研究’。通过与交通和移动性研究，以及和其他探讨信息社会不可避免的物质基础的研究领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这种观念将不断扩大‘传播’概念的意涵。”（亚当斯，杨森，2019）另一位美国学者丽莎·帕克斯（Lisa Parks）认为，媒体和传播研究者已经开始探索移动通信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关系，但很少有人考虑其基础设施的复杂物质性（Parks & Starosielski，2015：3）。她开始着手研究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如卫星、网线、电线杆和无人机）及其文化、政治和人道主义影响。帕克斯的研究涉及信息流动背后的物质和非物质力量，以及媒体、技术和地缘政治之间的多层关系。这与莫利的研究旨趣相近，注重传播、运输与地缘政治方面的联系。

莫利恢复传播研究的物质传统，重新发现传播与交通之间同源性的价值，有助于解决传播研究符号性和物质性之间的“离散”关系，弥合传播物质性和符号性的分裂。凯瑞曾把电报的出现视为“传播的一个分水岭”（凯瑞，2019：180），但是人们好像忽略了凯瑞的提醒：电报改变了，但没有替代自然地理所形成的连接方式，也就是由河流、脚步、马道以及后来的公路和运河所形成的自然地理连接方式（凯瑞，2019：157）。虽然凯瑞也意识到电报与传播的自然地理和交通运输等物质方式是共生的，但是他仍偏重传播的仪式观，因此在物质传播与符号传播的结合上，并没有走得更远。莫利从凯瑞那里获得灵感，强调传播研究物质维度的同时，并没有忽略符号传播的重要性，当今世界的传播体系是在两者之间重叠共生的

模式中构成，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共同组成了新的地理和政治竞争的场域，正如马特拉所言，“将传播视为社交空间生产中符号和物质技术的编排和组合过程，类似于乐队演奏，建构（和抑制）不同的话语模式，以及促进人、商品和文化的流通和互动过程。”（Morley, 2017: 28）传播的物质要素与符号信息共同组成了一个类似于“交响乐”演奏的整体，是传播研究不可分割的部分。莫利举了一个例子，英国广播公司（BBC）将一个全球定位发射器设备绑在集装箱上，随着集装箱在世界范围内“旅行”，观众可以即时收看视频传输的内容。一个在全球旅行的“箱子”让人们对于传播有了新的理解：传播不只是信息的传递、符号的交流，还是促使这些传输得以发生的物质基础，比如公路、铁路以及航运等。它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停留，被不同的人装卸，运输不同的商品，以及由于经济萧索，而不得被弃置。这个“平庸”的箱子讲出了很多故事，这些故事隐秘的发生，被人们忽略，但是它又提供了一个理解传播和运输关系的契机。这种方法也符合阿克里奇（Akriich）和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物质符号学”的提议，即意义是如何在原始的、非文本、非语言中被建立（阿克里奇，拉图尔：1992）。信息的符号传播与物的流动，以及其他各种内容的流动，构成了传播的多重景观。传播研究的物质转向，并不是简单地否定或者排斥符号传播，而是研究在共生模式之下，这些物质基础和符号信息是如何共同建设了全球化和地方性。帕克斯也认为，“对基础设施的关注凸显了媒体分布的独特物质性——资源、技术、劳动力，以及在全球、国家和地方范围内塑造、激励和维持视听信号通讯分布所需的关系。”（Parks & Starosielski, 2015: 5）关注传播的物质维度，并且与象征符号之间构成联动关系，才有可能进入到传播研究更宏阔的视野中来。重新发现传播物质基础的意义，对很多传播问题的考量就会增加历史性和语境性的内容。布莱恩·拉金（Brian Lakin）在城市基础设施理论框架内对尼日利亚北部关于电子媒体的引进和政治辩论作了细致的阐述，作为“创造制度化结构的技术和文化系统的总和”（拉金，2008: 6），他把城市化、城市社会化和媒体发展的过程，与媒体实践与媒体的物质、逻辑和制度条件联系起来。这也启发莫利在反思“无地方性”的新型赛博格世界的时候，更加关注物质地理环境，“即赛博网络越来越明显地利用基于地理位置的连接和参与者的实际身份（而非假扮的身份）”（莫利，2020）。那种认为互联网建构的虚拟世界可以超越实体空间的想法，受到质疑，人们也越来越关注虚拟和物质实体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这是对过于追求新技术导致的传播研究的窄化和“内卷”的一种克服；另一方面，重返研究的物质传统，也有利于恢复当代传播理论的历史基础。当

传播研究追逐不断变化的新媒介时，更需要有历史的观照：

一旦我们以这种在历史和地理维度上更微妙的方式看待问题，就会发现，不是从一个传播‘时代’突然走向另一个传播的‘时代’，而是新旧符号和物质传播技术之间存在着许多连续性、重叠性和共生模式。在多重形式的虚拟和实际联系不断变化的格局中，来自先前历史时代的旧幽灵仍然在赛博空间的小路上游荡，甚至最新技术的有效性依旧可以说最终取决于物质基础设施（莫利，2020）。

除了传播学自身发展的局限，现代性的诸多变革也是促使莫利重返传播研究的物质向度的原因。技术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新媒体影响甚至决定我们的生活，让人们相信这个时代是被技术决定的。但是，莫利的英国经验主义文化研究的传统和态度使他坚持在特定的环境、文化、政治、经济的背景下去思考技术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世界被分割成不同的“地方”，存在许多被遮蔽的人的生存形态和方式，一定程度上与整体判断存在巨大差异，这些方面不能被忽视。而“语境主义”研究中所体现出的客观和谦逊也正在于此。所以，莫利进一步在一个“加速的历史”过程中告诫人们：不能只是把目光投向技术发展的未来，同时也要关注一些仍旧发生作用的旧的基础设施。新旧技术共存的模式提示符号与传播物质之间连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若要恢复符号和物质之间的联系，莫利认为，就应该包括运输和其他流动的物质形式，关注“流动性”的潜力，从而指向“非媒体中心”的传播研究方向。

三、流动性：传播研究范式转换与问题延展

莫利重新定义传播议程，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引入“流动性”这一研究范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传播的理解，就包括了商品、人、信息和资本的流动。马特拉（2015：xiv）也认为传播涵盖了“财产、人员和信息的诸多交换和流动回路”。莫利引入“流动性”研究范式，与其重返传播研究的物质基础有关，旨在从流动性历史演化的角度重新定义传播。流动性问题长期以来属于交通运输领域研究的范畴，后来其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性不断提高，汇集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流动性转向’正在向社会科学蔓延和转变，超越了交通运输研究和社会研究之间的二分法，将社会关系纳入运输过程，并将不同形式的交通运输与通过远距离通信进行的复杂的社会经验模式联系起来。”（Sheller & Urry，2006：208）2005年左右，英

国交通部委托兰卡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厄里(John Urry)等学者撰写《社会网络与未来流动》(*Social Networks and Future Mobilities*)报告。厄里教授在《新流动范式》中,不仅解释了何为流动性问题,也为该问题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厄里还主编了《流动》(*Mobilities*)一刊,为学者讨论提供平台。社会学领域对“流动性”问题的考察,主要包括人员、资本、商品、技术、媒体和意识形态的流动。这里的“流动性”,被视为当代社会的组成形式,也成为当今社会具有本体意义的内容。“新流动范式”是以某种处于支配地位的移动系统去定义社会,“移动系统涉及到‘不同的流通方式和不同形式的流动资本’,并在不同的空间范围、沿着结构化路线在时空中分配人、活动、物体和信息(例如,小径、人行道、自行车道、铁路、电话线路、道路、林荫大道、计算机网络,以及机场)”(Morley, 2017: 66),确立这些流动性得以发生的网络是重要的。莫利关注流动性问题,与其重返传播研究的物质维度以及将虚拟和实体空间接合有关,三者之间也构成逻辑上的关联,特别是“交通运输和通信之间的趋同性越来越强,‘流动性’已经成为交通运输的要求和特点”(Morley, 2017: 66)。从莫利对流动性的分析来看:一方面,他从交通地理学和社会学的视域下考察流动性,其基本的解释框架、研究内容和范式深受厄里以及其他英国社会学家关于“流动性”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莫利的意图是想超越社会科学传统的“流动”视角(通常限于某一民族国家的领土),提供一种交通和流动的方法,以便更好地处理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而不仅仅是经济功能性的问题(Morley, 2017: 9)。因此,他从阶层、权力、等级等问题出发审视“流动性现象”,这也使他的阐释呈现出文化研究的气质和立场。

厄里把流动性作为新的研究范式的论述,以及英国社会学界和地理学界关于“流动性转向”(Mobilities turn)的讨论为莫利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厄里把流动性的问题扩大到与移动和旅行有关的诸多方面,并归纳出五重内容⁶。从这些内容来看,流动性不仅包括实体空间中人和物的流动,也包括虚拟空间中的信息流动以及想象性内容的流动,强调对人与物体的物理运动研究必须辅之以对想象、虚拟、通信和旅行的研究。马特拉在《全球传播的起源》(*L'invention de la communication*)中对物质的流动性演化为传播的社会性的研究影响了莫利,使他在人的流动(移民)、物的流动(集装箱)和信息流(手机)方面得以拓展,进一步思考地缘政治以及全球化问题。莫利也是从这几个方面进入“流动性”实践问题的考察:第一,交通工具的移动以及货物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可以说,迄今为止最便宜的远距离运输方式是集装箱或船运,这些不易察觉的物质基础设施构成了全

全球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集装箱在流动的过程中“使世界制造系统成为可能”，并且在它们的装卸过程中，再次证明了“标准化”对于全球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不仅如此，莫利还将运输中集装箱化的技术讨论置于更广阔的传播理论框架中，并将集装箱化和数字化作为两种不同的技术标准模式进行类比研究（Morley, 2017: 199）。当然，随着集装箱流动的不只是货物，还有病毒。随着疫情引发的危机，流动的风险性也被关注，很多国家将海外的生产链逐渐转移到本土。一旦这只流动的“箱子”停下来，那么全球化的世界会不会就此被“锁住”，这也是后疫情时代值得关注的问题；第二，考察人的流动性（移民、旅行、偷渡及其他）问题。对人的流动性的考察，一方面破除了“电子邮件和航空旅行构成了全球运动的整体”（Sekula, 1995: 50-51）的幻想，另一方面摆脱了流动即是浪漫主义“游牧式”的旅行印象，这里不仅伴随着大量非法移民的困顿与生死，并且各种“坏东西”（病毒或者武器等）也随着流动性增加为世界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显然，在人的流动过程中，要充分考察资本、数据、交通工具如何构成了一个联动的系统，成为移民线路上的助力或者阻力。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飙关于东北跨国劳工移民的流动性问题的研究，就包括跨国流动的“基础设施”、流动中的等级、权力关系和跨国监管等方面，这与莫利的研究异曲同工。这也提示传播学研究与人类学研究基于“流动性”范式在更多问题上有了接合的可能；第三，手机是“流动现代性的象征”，成为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接合交互的神奇“物件”。它不仅使得符号信息、身体、交通运输等问题因流动接合在一起，同时也是恢复符号与物质之关联的重要确证。莫利曾经讲过“手机的故事”（莫利, 2010: 222-223），但是将手机和移民连接在一起，却是他此前“故事”中未曾提及的。手机不仅是他们在长距离移民过程中信息获取的方式，还是“他们获得‘可接触性/连通性’资产的唯一途径”，物质运输和通信手段在身体移动过程中相互作用和持续有效（Morley, 2017: 199）。简而言之，莫利对流动性（移动性）的研究，除了关注身体、物体等可见流动，还关注相关的机构和基础设施框架是如何在不易察觉的情况下促进、引导和调节这些流动的发生，为传播在“非媒体中心”的研究上提供更多的路径。

流动性作为一个范畴，涉及到联系（各种关系的缔结）、距离（空间和位置）以及运动（流动过程中伴随性）。“流动性不仅仅是把人和商品从A地运到B地。事实上，流动性被看作是提供工作场所和便利设施的一种手段，还被更广泛地看作是现代社会的构成框架。”（Shaw & Hesse, 2010: 306）这也是流动性成为传播学与交通地理学共同关注的原因。汽车、火车和飞机这些交通工具与各种通讯技术

一起，将人的社交网络从区域性扩大到全球范围，帮助人们建立了不同的联系。但是，在这其中，究竟什么样的物质设施框架引导和调节了它们之间的流动实际上更值得关注，而这恰恰是容易被传播学界忽略的内容。

流动性也与权力结构以及等级制度相关。莫利在思考流动性问题时秉持他一贯的批判立场，流动性与权力和社会排斥等因素密切相联。具体来说，不仅是物的流动，而是在发生流动的过程中，什么决定了这种流动，流动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如果圣保罗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多地搭乘直升机频繁地往返于他们公寓楼顶的停机坪，他们的佣人们则需要每天花费4-5小时乘坐公交车往返于他们居住的贫民窟（Cwerner, 2006; Scudamore, 2010）”（莫利, 2020），交通工具决定了速度、联系和进入的可能，也通过时间（速度和等待）制造了新的社会区分。人们对时间和速度的理解不仅依赖媒介，事实上更离不开具体的生命经验建构起来的时空观念，而这些并不为大多数的传播学者重视。比如，不同的人进入一个国家边界的方式不同，也会受到不同的待遇：一个驾驶名牌汽车身着考究的人戴着太阳镜从车窗里递出文件，而另一个乘坐破旧的汽车的人，却被边检人员把他们的旅行箱翻个底朝天。可见，在跨国流动中，按照交通工具等级体系进行的划分依然发生作用，社会排斥也成为各种流动性发生的障碍。在繁忙与闲暇、行进和等待中人们已被划分进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莫利关心的是：谁可以通过什么形式获得象征性或者现实性的移动和交流。全球化促进了人的流动性，不仅是地理上的也是国籍上的，不仅包括富裕地区的旅行者和移民人口，也包括难民和偷渡客。这个中心议题让人们回到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包括哪些人有车，哪些人可以同时拥有互联网和实在的交通工具？莫利提出的问题也在朱莉安·海因（Julian Hine）那里得到回应，“流动性与交通不利条件之间的联系是深刻的，对塑造个人和社区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影响。使用交通工具的不同（交通不便）也与社会排斥和获得商品和服务的难度有关。交通便利与贫困、可持续发展、社区再生具有强大的协同作用。”（Hine, 2011: 21）因此，厘清流动的不同形式、速度和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以及对“时间”不同的处理方式，都成为社会区分的一个表征。

莫利关注“流动性”新范式，考察社区、位置以及流动性等概念，是基于历史和语境化的前提，旨在超越游牧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对立。现代社会是围绕着人、信息、以及物体的移动而组织起来的，而不是被静态的关系、结构和制度组织起来的。传播作为一个和人类伴生的古老过程，显然有更复杂、更丰富的内容。“社会

科学中的‘物质性’和‘移动性’之间是否存在（或者应该存在）一种新的关系？我们的‘认知’模式是如何被我们想要研究的‘移动’过程所改变的？”（Sheller & Urry, 2006: 212）这些问题也给传播研究者更多可延展的方面。从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文明史纲》（*Histoire Et Civilizations*）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时间维度还是从空间维度，人类文明的接续和发展，都伴随着巨大的流动性，这里包括人的大规模流动（迁移或者战争）、贸易往来、宗教传播以及各种交通工具和运输系统的发展。“没有一个文明能够不流动地生存”，无论是大河文明还是海洋文明。如果从传播的角度来解释的话，其共性都是和水运有关，这也是流动性发生的物质基础。不过，虽然“交通地理学家可能认为流动性过于文化化，而研究流动性的学者有时认为交通地理学过于传统”（Shaw & Hesse, 2010: 307），但随着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的传播，一方面是超级流动性带来了新的困境，比如集装箱的流动带来的“坏”的方面引发了对全球供应链的悲观预期；另一方面，也需要重新思考封闭和稳定性带来的另一种选择。这需要来自交通地理学、传播学以及社会学等多元化的视角。

四、结语

莫利通过“重新定义传播”，引发了对传播研究议程和传播范式的思考，也意在重返当代传播理论的历史基础，其价值在于将被遮蔽的与传播相关的内容再次呈现在人们面前。正如莫利所言，如果我们采取以媒体为中心的方法，而不是将通讯技术置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之中，特别是与运输问题相关的背景之中，就不可能理解通讯技术的全部意义。这是近年来传播研究物质转向思考中的重要进路之一。欧洲大陆的一些理论家也探讨传播研究的物质性问题，比如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A. Kittler）探讨物质技术媒介，诸如留声机、电影、打印机的发展历程对人类思维方式产生的影响，反思媒体技术与人类的关系，这是不同于莫利的另一条路径。“流动性”也成为分析传播学研究议题的重要范式，这一范式接合传播研究很多重要的问题，比如交通工具及其基础设施、物的流动、人的流动，甚至是病毒的流动等，对全球化以及地缘政治等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将传播研究领域定义为各种物质和非物质形式的有组织的运动和行动已经成为较多学者的共识，一些学者研究地铁等交通基础设施、城市物流等问题，显示出基础理论研究转向对学科研究的影响，比如，刘海龙教授关于病毒传播学的诠释框架，将病毒等物质性的传播纳入普遍意义上的传播进行了思考，为如何从物质性的角度进行

传播研究提供了范例（刘海龙，2020）。莫利曾在新兴的互联网技术条件下，反思信息空间和文化认同，并从后现代地理学的视角审视物理地理边界以及各种移民社区问题，如今再谈及空间问题，已经与二十年前有很大的不同。莫利修正了此前的观点，重新对实体空间的价值予以重视，“新兴的批判性研究认为，赛博空间本身具有完全可识别的地理形态，其中的路线和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早期通讯方式的结构和模式（Dodge & Kithin, 2001; Crampton, 2003; Zook, 2005）。”（莫利，2020），移动的各种形式成为把这些虚实空间连接在一起的“粘合剂”。

作为英国乃至世界媒介和传播领域的著名学者，莫利的研究也对整个传播研究的转向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英国媒介和传播研究的经验主义传统和批判性的立场，以及面对具体传播研究对象的历史维度和语境主义特色。莫利将媒介研究、科学技术的研究、交通研究、社会学以及文化地理学所涉及的流动、领土和运输等问题结合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把传播研究带入更开放、更有生命力的与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视域之内。但是，莫利并不否定信息符号研究，他试图超越媒体中心主义研究范式，也意在关注这些物质基础设施如何隐秘地影响和构建了社会互动方式以及权力关系。在与北美和欧洲传播理论家思想的交光互影中，莫利等学者的探究也逐渐扩展为世界范围内传播研究新的发展趋势，为传播研究议程提供更多可能性——传播研究不再局限于符号和信息论，传播学研究方法论也将得到更新，有助于形成传播学研究的新局面。

（责任编辑：吴欣慰）

注释 [Notes]

1. 《传播与流动：移民、手机与集装箱》一书是戴维·莫利2017年出版的新作，目前没有中译本。该书主要研究21世纪流动性、领土、传播和交通运输等问题，在新移动性和当代地理学视域下重新构架了媒介和传播的关键概念，并研究了移民、手机和集装箱作为这个时代三个标志性的案例，促使媒体和传播领域的学者可以回到更广泛的传播概念。
2. 本文将Mediacentrism译为“媒体中心主义”而不是“媒介中心主义”，是因为这里media尤其是指运用大众媒体进行的符号信息传播，比如广播、电视、报纸也包括互联网等。同时，特别是德布雷等学者对于媒介的定义，其内涵超越大众媒介中的“媒介”意义。因此，本文使用了“媒体中心主义”而不是目前被使用较多的“媒介中心主义”。
3. 雷蒙·威廉斯认为，15世纪以来，communications有了现代的普遍意涵；从17世纪起，有一个重要的引申意涵“传播媒介、通讯工具”；在道路、运河与铁路蓬勃发展时期，communications是一个抽象名词，代表通讯设施；进入20世纪，随着传递讯息与维系

社会联系的工具不断发展，也可用来指涉媒介（media）；现在通称的communication industry 和transport industry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指报纸、广播里的资讯观念；transport，是指载运人与货物的交通工具。详见雷蒙·威廉斯（2005）。《关键词》（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73-74页。

4. 在约翰·菲斯克那里，传播的定义大致有两种，“第一种定义是将传播视为一个过程，并产生效果；第二种定义将传播看作是意义的协商和交换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讯息、文化中的人以及‘真实’之间发生互动，从而使意义得以形成或使理解得以完成，涉及文本、解读者的符号和符码，以及解读者的文化与社会经验等。第一种是拉斯韦尔式的，第二种是结构主义。”详见约翰·费斯克等（2004）。《关键概念》（李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第45-46页。
5. 莫利在高中时期主修经济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时主修社会学。
6. 这五重内容分别是，第一，人们为工作、休闲、家庭生活、娱乐、迁徙和逃避而进行的实际旅行；第二，交付给生产者、消费者和零售商的物品的实际移动；第三，通过在文本、电视、电脑屏幕和电影中看到的图像和记忆，在别处进行富有想象力的旅行；第四，网上虚拟旅游；第五，通过信件、明信片、生日贺卡、圣诞贺卡、电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即时消息、视频会议和“视频网络”等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旅行。详见Jonas Larsen, John Urry, Kay Axhausen (2006). *Mobilities, Networks and Geographies*.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pp4.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阿芒·马特拉，迈克尔·马特拉（1995/2008）。《传播学简史》（孙五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阿芒·马特拉（1996/2015）。《全球传播的起源》（朱振明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保罗·C·亚当斯，安德烈·杨森（2012/2019）。《传播地理学：跨越学科的桥梁》（李焱，魏文秀译）。《新闻记者》，（9），83-96。
- 戴维·莫利（1995/2001）。《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司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戴维·莫利（2007/2010）。《传媒、现代性与科技：“新”的地理学》（郭大为等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戴维·莫利（2020）。《传播与运输：信息、人和商品的流动性》（王鑫译）。《新闻记者》，（3），71-82。
- 杜骏飞，周玉委（2014）。《传播学的解放》。《新闻记者》，（9），33-39。
- 戴宇辰（2020）。《“物”也是城市中的行动者吗？——理解城市传播分析的物质性维度》。

- 《新闻与传播研究》，（3），54-67。
- 丁方舟（2019）。论传播的物质性：一种媒介理论演化的视角。《新闻界》，（1），71-78。
- 费尔南·布罗代尔（1962/2003）。《文明史纲》（肖昶，冯棠，王明毅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弗雷德里希·基特勒（1985/2017）。《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邢春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哈罗德·伊尼斯（1950/2003）。《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黄旦（2014）。对传播研究反思的反思——读吴飞、杜骏飞和张涛甫三位学友文章杂感。《新闻记者》，（12），40-49。
- 克劳斯·布鲁恩·延森（2010/2014）。《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雷吉斯·德布雷（1991/2014）。《普通媒介学教程》（陈卫星，王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雷蒙·威廉斯（1976/2005）。《关键词》（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刘海龙，束开荣（2019）。具身性与传播研究的身体观念——知觉现象学与认知科学的视角。《兰州大学学报》，（2），80-89。
- 刘海龙（2020）。病毒的传播学。《信睿周报》，（29）。
- 吕清远（2019）。作为经验的传播：传播学研究物质性转向的逻辑进路与范式转换——在二元对立的传播观念当中寻找一条中间路径。《新闻界》，（8），70-79。
- 孙玮（2014）。为了重建的反思：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新闻记者》，（12），50-58。
- 吴飞（2014）。何处是家园？——传播研究的逻辑追问。《新闻记者》，（9），40-47。
- 王琛元（2018）。欧洲传播研究的“媒介化”转向：概念、路径与启示。《新闻与传播研究》，（5），5-26。
- 无菡，项飙（2020）。《专访项飙（上）——“流动”的革命：跨国移民网络的基础设施》。微信公众号：澎湃思想市场。
- 约翰·费斯克等（1993/2004）。《关键概念》（李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 约翰·杜翰姆·彼得斯（2002/2017）。《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袁艳（2019）。当地理学家谈论媒介与传播时，他们谈论什么？——兼评保罗·亚当斯的《媒介与传播地理学》。《国际新闻界》，（7），157-176。
- 詹姆斯·凯瑞（2008/2019）。《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张涛甫 (2014)。新闻传播理论的结构性贫困。《新闻记者》，(9)，48-53。

章戈浩，张磊 (2019)。物是人非与睹物思人：媒体与文化分析的物质性转向。《全球传媒学刊》，(2)，103-115。

Adams, P. C., Cupples, J., Glynn, K., Jansson, A., & Moores, S. (2016). *Communications/media/geographies*. New York, NY: Taylor & Francis.

Axhausen, K. W., Urry, J., & Larsen, J. (2012). *Mobilities, networks, geographies*. Hampshire, UK: Ashgate Publishing, Ltd.

Akrich, M., & Latour, B. (1992). A Summary of a Convenient Vocabulary for the Semiotics of Human and Nonhuman Assemblies. In Bijker, W. E., & Law, J. (Eds.). *Shaping Technology/Building Society: Studies in sociotechnical change* (pp.99-111). Cambridge, NY: MIT Press.

Morley, D. (2017). *Communications and mobility: The migrant, the mobile phone, and the container box*. West Sussex, UK: John Wiley & Sons Ltd.

James W. Carey (2009).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Julian Hine (2011). Mobility and Transport Disadvantage. In Margaret Grieco, John Urry (Eds.). *Mobilities: New Perspectives on Transport and Society* (pp.21-40). Hampshire, UK: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Larkin, B. (2008). *Signal and Noise: Media, Infrastructure, and Urban Culture in Nigeria*. Durham, UK: Duke University Press.

Parks, L., & Starosielski, N. (Eds.). (2015). *Signal traffic: Critical studies of media infrastructures*. Illinois,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oja, E. W. (2013). *Seeking spatial justice* (Vol. 16). London, UK: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heller, M., & Urry, J. (2006).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8(2), 207-226.

Sekula, A., & Buchloh, B. H. (1995). *Fish story* (Vol. 202). Düsseldorf, BRD: Richter Verlag.

Shaw, J., & Hesse, M. (2010). Transport, geography and the 'new' mobilitie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5(3), 305-312.